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从西郊的屋顶上能望到什么

——评徐则臣小说集《北京西郊故事集》

李壮

《北京西郊故事集》收录的作品，有许多写于2010年前后，而小说里的故事，看上去也与这个年份相距不远。我回忆了一下那段时期。那正是北京奥运会结束后的几年，全球化的繁荣浪潮与大国崛起的热切想象共同鼓动着几乎所有人的神经，北京，似乎成为了一种象征、一处符号般的存在。它意味着现代世界的舞台前沿，意味着人生在世的另一种逻辑，意味着理想乃至幻梦的实现可能。如同一枚巨大的磁极，北京把来自四面八方的“铁屑”——那些千姿百态甚至奇形怪状的人物、故事、话语、梦想——吸附到自己的身边，让它们如此近距离地挤靠、碰撞、摩擦生热或者相互消磁。

《北京西郊故事集》里的故事，多是关于那些最外围、最边缘的“铁屑”。所谓外围与边缘，在徐则臣的笔下，首先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具体直观的空间位置问题——“西郊”这两个字本身便说明了一切。“我”、行健、米箩，这组基本贯穿每篇小说的“铁三角组合”，租住在北京西郊的一座平房里面。间或有其他人物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之中，担当起书中某几个故事的主角，他们大多与三人共享着相似的空间定位：工作或日常居所与三人临近，或者干脆曾搬进这“三缺一”的简陋小窝里做过室友。在小说的语境中，西郊这片平房区，相当于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属于“京内”“京外”的过渡地段。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只有平房院落、苍蝇小馆以及错综凌乱的无名巷落；而这些匍匐在地的小院小馆小巷，本身也长期处在不稳定的状态中：这片空间的身份是暧昧，甚至不太合法的，遍地的旧房危房和违章建筑随时都可能被清查和拆除（类似情况在《兄弟》一篇里写到过），到那样的时候，这些悬挂在都市空间外围的赘生物就会像息肉一样被精准剔除。在这样的时刻，空间层面的“外围”“边缘”状态融入了时间层面：失去空间同时意味着失去时间，这里的一切都是暂时性的，它看起来并没有真正进入这座城市的历史话语谱系。由于空间身份存疑，时间在这里也是悬浮、透明，可以被暂停或剪辑掉的。

因此，对于生活于斯的小说人物来说，“外围”与“边缘”，无疑又是一种抽象的处境象征。从题材类型上讲，《北京西郊故事集》里的大部分小说，属于较为典型的“北漂青年”故事。租住在西郊小平房里的这些年轻人，大都共享着相同的身份背景：来自外地（乡镇之类的小地方），缺少学历等必要的求职砝码，怀揣着或大或小的梦想，心事重重（又

或愣头愣脑）地开始闯荡北京。他们满怀渴望，同时又缺少立足北京的必要资本（货币意义上的以及身份意义上的），因此只能游弋在现代都市运行体系的边缘地带。有一处细节是很有意思的：“我”和同样以张贴小广告为生的小伙伴们，为了避开城管与环卫工人，只能昼伏夜出展开“工作”。深夜无人的街道，才是他们的现世人间，至于那个忙碌、有序、依托于时代想象并不断对这想象展开再生产的白昼北京，是他们没有能力、也不被允许触碰的。

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奇妙的临界状态：他们来到了北京却似乎又进不来北京，身在北京的同时又不在北京，就像舞台上明明正上演着火热沸腾的时代大戏，一个人却忽然忘记了自己究竟是演员还是观众、只好卡在台口的台阶处进退踌躇——这有些像卡夫卡的《城堡》，只不过徐则臣的小说少了些抽象的荒诞感，而多了些人间烟火气、多了些闹闹腾腾的俗世乐趣与底层温情。老实说，我们很难想象行健、米箩们的小脑袋中能张罗起如此哲学化的内心戏，但可以想象的是，在某些莫名的、不可期的时刻，他们也会面对着类似的踌躇、陷入到类似的“恍然大悟”当中。于是，出现了《北京西郊故事集》里一种“招牌性”的、同时也极富象征意味的姿态：登上屋顶，遥望北京。在这组充满烟火气和喧闹声的小说里，这是沉思乃至沉默的重大时刻。当然，对行健、米箩和“我”来说，这样的时刻并不见得有多重大，它往往在不自知、不经意的语境中降临，有时还会以貌似雄心壮志的喜剧化方式呈现出来：

“‘看，这就是北京。’行健在屋顶上对着浩瀚的城市宏伟地一挥，‘在这一带，你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房子了。爬上屋顶，你可以看见整个首都。’”（《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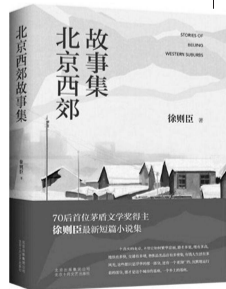
“‘我一直想到你们的屋顶上，’慧聪踩着宝来的凳子让自己站得更高，悠远地四处张望，‘你们扔掉一张牌，拾个头就能看见北京。’”（《如果大雪封门》）

“‘同志们，放眼看，我们伟大的首都！’捉完黑A，米箩总要伟人一样挥手向东南，你会感觉他那只抒情的右手越伸越长，最后变成一只鸟飞过北京城……最后很可能只剩下一只鸟飞过天空，就是米箩那只抒情的右手，无论如何也拉不出来屎。但这不妨碍所有冲进北京的年轻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轮子是圆的》）

这是一种朴素的乐观，掺杂着几分近乎混不吝的对未来的期待。这样的乐观与期待飞翔在书



遥望的潜台词是隔绝，进不去的人才会去远处眺望。但是眺望的另一个潜台词又是看清，相比于浸没其中的人，眺望者看到的才是结构、是全景、是凝结沉淀之上的升腾，甚至是生存那宏阔而虚空的本身。



里每一个故事之中（尽管常常跌落在地），它照耀着城市边缘小人物们的柴米油盐、爱恨喜悲、奇遇相逢，把他们的生活烘晒得晕头转向而又热气腾腾。其实，他们站上屋顶的时刻并不多，多数时候他们是在奔走、穿梭、挣生活、找女人；即便来到屋顶，他们做得更多的事也是低头打牌。然而，只要他们抬起头来遥望和打量，便注定会迎面撞上一连串巨大的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来北京找什么？在这样的时刻，别看故事里的人依旧撑着一副嘻嘻哈哈不以为意的架势，个体自我与这座城市、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关系，实际都会在情节的表皮之下受到重新的审视。

遥望的姿态呼应着我前文提到的临界状态。遥望的潜台词是隔绝，进不去的人才会去远处眺望。但是眺望的另一个潜台词又是看清，相比于浸没（也许更准确的词是“吞没”）其中的人，眺望者看到的才是结构、是全景、是凝结沉淀之上的升腾，甚至是生存那宏阔而虚空的本身。正像阿甘本所说的那样，“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在各方面都紧系于时代的人，并非同时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无意之中，这些游荡在时代外围、无知而躁动的年轻人，在北京西郊的屋顶上完成了一次凝视。这是身心临界状态下微妙受力的产物；它与“我”神经衰弱时的“奔跑”，拥有着相同的精神结构。

进而，从遥望的象征姿态中，派生出诸多具体的动作，就如同微妙的受力状态最终往往会导向强烈的应激效果。就像一座高高矗立的水塔，那些屋顶遥望的身影，向小说中一系列具体的现实动作灌入了无形而持久的动力，让情感的势能从天空下沉至地面、从头顶传递到脚底、从相遇涌流向分离：奔逐（《轮子是圆的》）、追踪（《如果大雪封门》）、抚爱（《成人礼》）、殴斗（《看不见的城市》）、流浪和歌唱（《摩洛哥王子》）……在这些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动作背后，挥之不去的是那几抹静立屋顶的身影，以及那些在每次的遥望中被悄然唤起的纠结与执念——关于爱，关于梦想，关于孤独，关于走与留、聚与散、溃败与坚持，关于同样虚妄的绝望与希望。

说到“执念”，我想起同样是2010年代初，我坐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小花园里，读完了《跑步穿过中关村》。那是徐则臣更早期的代表作。我记得自己是那样深地陷

入了徐则臣的语境，毕竟于我看来，在铁狮子坟的校园里读研究生跟在中关村大街上卖盗版光碟之间，未必有多么本质的区别——作为外省来的年轻人，我们同样不确定未来将会如何，为了留在北京、为了能用更长久的岁月去接近心中始终执着的渴望，我们都不惜吞下更多的辛酸和苦楚。那一个傍晚，我掏出随身携带的钢笔，在书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小说的悲剧性力量来自如下事实：他们，这些奔跑在现代都市边缘的‘局外人’，每日谙熟着文明世界里的丛林法则，却始终对人与人之间那点体温的呼应、以及人为人那卑微却明亮的尊严，抱有致命的执念。”其实，当我说“他们”的时候，想着的是“我们”。今天，在许多年之后，我又找出了当年那本书和书上我写下的话。我意识到，即便此刻的我已经实现了当初日思夜想的目标（体面地留在北京，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我依然不敢说自己不再游荡于某种边缘。或者说，我们身边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各自的维度上，孤独游荡于生命和世界的边缘，这是一个本质化的判断，它由人类自身天然的有限性所决定。进而我发现，当年的那段话对于《北京西郊故事集》似乎同样有效——当我又一次读到《如果大雪封门》里徐则臣对雪落帝都的想象，那场面里不仅仅有“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不仅仅有“银装素裹无始无终”，还有“每一个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衣走出来的人都是对方的亲戚”。

“下了大雪你想干什么？”他问。

“我要踩着厚厚的大雪，咯吱咯吱把北京城走遍。”（《如果大雪封门》）

《如果大雪封门》的鲁迅文学奖授奖词里写道，这是一个梦想与现实、温情与伤害、自由与限度相纠结的故事，它在呈现事实的基础上，有着强烈的升华冲动，就像杂乱参差的街景期待白雪的覆盖，就像匍匐在地的身躯期待鸽子的翅膀”。在此意义上，《北京西郊故事集》里的小说，很多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徐氏“名作”的“姊妹篇”（当然，《如果大雪封门》本身也收录在书中）。同样是关于雪，我想起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的雪》里开篇写到的那只豹子：“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那么，当小说里的“我”走上屋顶遥望北京，他又是到这样边远的高处来寻找什么呢？

他想要望到的是什么？他望到了吗？我们呢？